

1981

哲学年会文稿选

全国党校第二届哲学年会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哲学年会文稿选

全国党校第二届哲学年会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哲学年会文稿选

全国党校第二届哲学年会稿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文化部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 16印张 330千字

1982年2月第一版 1982年2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2230.38 定价：1.60元

目 录

关于在哲学教学中贯彻《决议》精神的几点意见

——在全国党校第二届哲学年会上的讲话（摘要）……韩树英（1）

对毛泽东同志哲学思想的几点认识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的体会……云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13）

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历史地位

……北京市委党校 苏厚重（24）

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

……辽宁省委党校 王长明 关九英（32）

毛泽东哲学思想特点的初步研究……江西省委党校 李克（40）

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几点看法……四川省委党校 童荣 卢志清（49）

始终不渝地坚持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学习毛泽东同志八篇著作的体会

……重庆市委党校 游方序 范成钧（56）

关于《矛盾论》教学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中央政法干校 王培英（64）

《矛盾论》是左倾错误的理论基础吗？……福建省委党校 蔡彦士（73）

学习毛泽东同志军事著作中的哲学思想……中央党校 卢国英（77）

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学习辩证唯物主义

的认识论……江苏省委党校 晏东云 纪迅（92）

认真总结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经验和教训……天津市委党校 王子彬（98）

关于左倾错误哲学基础的一点认识……黑龙江省委党校 霍方雷（105）

关于我国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根源……中央团校 曲春郊（111）

客观地运用辩证法，反对主观随意性

……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校 黎影材 姜师庆（120）

论发扬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性的关系

……北京市委党校 孙建东（125）

坚持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山东省委党校 吴玉黎 (133)
略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环节

..... 浙江省委党校 魏继让 (143)
试论精神对物质的决定性反作用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党校 濮良贤 (147)
精神转化为物质不能离开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

..... 山西省委党校 陶亚杰 (153)

试论矛盾精髓问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上海市委党校 冯其舜 朱伊倬 冷鹤鸣 (159)

论“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 黑龙江省委党校 于克旺 (168)

论绝对和相对 中央党校 马清健 吕英寰 (175)

共性、个性、客观性 湖南省委党校 艾天秩 徐新民 李纯序 (184)

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广东省委党校 谢克 (192)

关于对立面同一相对和对立面斗争绝对问题之管见

..... 陕西省委党校 武继荣 任应科 (199)

谈谈矛盾同一性 辽宁省委党校 孟金山 (202)

只有矛盾着的对立面又斗争又同一才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 大连市委党校 周杰 (208)

坚持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主次关系问题的辩证法原理

..... 全总干校 吴英杰 徐松林 (213)

矛盾主次原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湖北省委党校 曹仁杰 向延光 刘吉荣 (223)

试论辩证法中的联系 辽宁省委党校 狄凤山 (234)

关于事物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的辩证关系的一些探讨

..... 甘肃省委党校 刘德昌 (239)

差异和矛盾关系的考察 安徽省委党校 赵振华 (245)

编 后 (248)

关于在哲学教学中贯彻 《决议》精神的几点意见

——在全国党校第二届哲学年会上的讲话（摘要）

韩 树 英

今天就关于在哲学教学中贯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问题和同志们交换一下意见，想分两个部分说一说。

我们学校下学期教学的设想

先介绍一下轮训班，也就是高中级干部轮训班。我们学校已经办了六期这种班了，下期轮训班将有一些变化。我们复校以来，最初几期学几门课，后几期学三中全会确定的三条路线，拨乱反正。现在，《决议》已经发表了，我们的教学计划经过几次讨论，现在已经基本定下来，叫做围绕《决议》或者说结合《决议》进行几个单元的教学。当然这里面包括学习六中全会的公报，学习耀邦同志在庆祝党的生日大会上的讲话。这个学习又是按照中央的精神和中央的22号文件——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怎样学习《决议》这个文件的精神，结合我校学员的情况，来安排学习的。我们分几段学。第一段用十五个左右学习日，从总的方面来学《决议》；第二段从思想路线方面或者哲学方面来进行学习，大体上用二十四、五个学习日；第三段是科社教研室承担的，关于社会主义这一方面问题的学习，也是围绕着《决议》学，大概用十几个学习日；第四段是政治经济学，用四十多个学习日；第五段是党的建设，十个学习日。

按照六中全会精神和《决议》精神，学习就要正确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其次是三十多年的是非功过的正确评价，在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团结一致向前看，贯彻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全党的干部都在学《决议》，到中央党校怎么学？今年我们这一期是四个半月，大家有那么一个想法，总的来讲，要理论联系实际。要从理论上加深对《决议》的认识，就是说还要学理论，还要学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著作。学习要联系实际，就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要继续在实际工作中拨乱反正。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已经完成，但是，正如耀邦同志讲的，在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还有待于我们继续努力。要继续清除“左”的影响，提高对贯彻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所以，总的来说还是耀邦同志讲的那四句话：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振奋精神，搞好生产。

第二段是哲学教学，是思想路线方面的教学。那末，和以往比，我们有什么变化没有呢？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思想来安排教学的，还要继续学一些马列的著作，如《费尔巴哈

论》第二章、第四章，还有其他著作的个别篇章。这次准备加强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的教学辅导工作，因为明年全党学哲学，今年下半年我们作一个过渡。因为只有二十四、五天时间，除了《实践论》、《矛盾论》以外，还准备选一篇军事著作作为必读书。轮训班大体就是这么一些情况。

第二，关于理论班。

今年理论班其他专业都不办了。按原计划要办500人的为明年全党学哲学培养一部分辅导力量的哲学进修班。这个班主要学习毛主席的有关哲学著作，也就是八篇著作：

《实践论》、《矛盾论》，还有四篇军事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加上《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这两篇政治性的著作。还学党史、近代史。结合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也要学一点马列的著作。

办这个班是我们学校的领导同志提出来的，要求下决心把其他各个班停下来办这个班。后来这个班的名额是450人。有的省委党校反映，由组织部门统一分配，结果到省委党校可能就剩一个人了。这个班现在又追加了30个名额，加到480人。

这个班根据什么精神办？我们有一些设想，这里提出来，请同志们一起帮我们拿主意。同志们知道，今年8月小平同志在讲话中说到，他赞成陈云同志的提议，明年全党学哲学，学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最初提了七篇，后来加了一篇，就八篇了。小平同志在讲话中还提议，要加学一点党史、近代史。他讲，我们别的运动都不搞了，但是学习运动还要下决心搞。后年全党整风。看来明年全党学哲学是为后年全党整风作思想准备的。陈云同志前一段讲，在延安毛主席告诉他，要学哲学，他学了哲学，收益很大，对实事求是，经过哲学学习，印象非常深。他说，毛主席的功劳很多，但很大的一个方面是他培养了一代干部，包括他自己在内。小平同志在赞成陈云同志的提议时，有一段话，大意是：现在议论很多，多半是看现象，没有根底，要学哲学。所以，我们可以从陈云、小平同志的讲话来领会全党学哲学的意义。

明年全党学哲学究竟怎么学法，相信中央会有具体的部署、要求。我们现在办的这个班还不是全党学哲学这种性质的班，是为这种学习培养一部分辅导力量的班。这个班到底怎么办？方针是什么？我们开始说要办这个班的时候，学校同志讲过这么一句话：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要和清“左”相结合，这个“左”是讲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前不久又传下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一句话：学习要联系实际。这句话很值得我们认真地去领会。我就这句话谈点个人的体会，和同志们交换一下意见。我们过去学习马列就是主张理论联系实际的，今天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也是这个精神。同志们都知道，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文章中，毛主席讲，在职干部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我想，我们今天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也要联系实际，也应废除孤立地、静止地研究方法，不是为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而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哲学学习，应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端正思想方法，把我们党的干部的思想提高一步，把思想统一到《决议》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为什么要选这八篇著作呢？这里面有什么关系？值得研究。我和几个同志初步想了一下。八篇里面有两篇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比这两篇要早，是一篇军事著作，从中可以看出和两篇哲学著作的思想联系。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到《实践论》、《矛盾论》，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三篇军事著作，到《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我们可以看出来毛主席哲学思想的一个来龙去脉。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著作，是《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思想在军事方面的光辉运用和发挥，《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是在政治方面的光辉运用，解决革命基本问题方面的光辉运用和发挥。这八篇著作，都体现了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而且是从不同方面发挥了具体化了这个思想。

学习了这几篇著作，提高思想方法的水平，懂得了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是怎样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也就可以懂得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怎样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就知道怎么样做是对的，怎么样做就是不对的，可以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更深刻的了解，可以提高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水平。

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从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已经完成了，中央通过了《决议》，对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将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工作调整，从组织上也做了解决。经过全党学哲学，然后整风，可以从更高的程度上统一全党的思想，迎接新的胜利。一九四二年整风，是先整风，然后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往前说，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全党的统治，以后也经过了一系列的清除错误思想影响的工作。经过抗日战争，许多干部已经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认识到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所代表的路线是正确的，而王明是错误的。在整风以前，如果说主要在军事上政治上大家已经体会到这点，那么经过整风这种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就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总的方向上，在思想上，有了更大的提高，形成了全党空前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从而赢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我们现在是经过拨乱反正，先作《决议》后整风，这是由于有不同的条件。不过我们可以相信，由于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正确路线，现在又做了《决议》，再经过学习哲学和全党整风，就可以大大地促进全党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团结，来迎接新的历史时期的更大胜利。

这个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要有的放矢，要解决矛盾，要解决问题，首先是干部思想上的矛盾，要提高全党贯彻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这个班具体的学习办法是什么？我们也有一些想法，准备试验着来。据说有几个省委党校也想办这样的班，我们可以互相交流意见，把这个班办得更符合中央的要求。

对几个问题的认识

从中央领导同志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要理论联系实际的指示得到启示，我对学习《决议》，学毛泽东哲学思想，有一些想法和体会。

第一，谈谈如何全面地深入地领会《决议》精神和六中全会精神。

《决议》的水平是非常高的，是写得非常好的，它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正象公报上讲的：“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决议》充分评价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我们听了冯文彬同志传达报告的录音，读了邓力群同志的讲话记录，大家对《决议》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小平同志不是讲过吗？不解决好这个问题，那整个《决议》都可以不作。可见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那末，《决议》为什么会产生一个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伟大意义的问题呢？为什么作为《决议》的写作的指导思想要强调这个问题呢？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我们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干部和群众对毛主席的功过和晚年的错误，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的看得比较轻，有的看得比较重，这个不奇怪，会有各种各样的认识。在国外，还有一些人说我们现在的党中央在搞“非毛化”。所以写这个《决议》，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论述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世代地传下去。学《决议》一定要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统一认识，在教学中也一定要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意义的任何低估都是错误的。我想这个道理从传达报告中，已经可以了解得很清楚了。

但是，学习《决议》，讲《决议》，是不是讲这一条就够了呢？是不是不要注意别的问题了呢？例如三十多年的是非功过，我们党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就不要讲了，就不要研究了？我看不能这样理解。在我们的会上已经有几位同志的发言提到了这个问题，即现在在一部分同志中间好象学《决议》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解决毛主席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可能会有这种苗头，认为中央已经讲清楚了，学习《决议》就是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如果再讲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就会影响到对毛主席地位的看法，有损于毛泽东思想。会不会有这种看法呢？可能有，但愿没有。我看不是这样，《决议》本身就讲到，我们三十几年来取得的成绩不能忽视，但是“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来体会。多年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工作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后果非常严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这个大家体会都很深刻。我们学哲学的都知道，哲学不是讲因果联系吗？你想去掉那个结果，就必须认识清楚造成那个结果的原因，这是个认识问题。另外还有个实践问题，必须把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去掉。我们看不清楚带来这个严重后果的原因，那么我们在行动上就不能积极去防止这场灾难重演，就会造成更大的错误。所以我们说要全面地深刻地领会《决议》精神。

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分不清，也不引导我们的人民去分清哪些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毛泽东思想，哪些是毛主席晚年的错误，那就是一笔糊涂帐。你对错误的不知错在哪里，正确的也不知道对在哪里，那就叫头脑不清醒。我们不能回避三十多年的经验教训，这不等于要贬低毛泽东思想，

不等于要贬低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的伟大地位。问题在于说得清楚，说得恰如其分。

不仅如此，公报还有一段话说：“《决议》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这也就是说，《决议》进一步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总结三十几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就不能认清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也就看不清楚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转折的意义。现在有一些人不是说吗：“三中全会的路线右了，我等着瞧”。有这样认识的同志，也就看不清楚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转折的意义。这么一种思想状态，你叫他怎么样去执行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呢？

所以不肯定毛主席在中国的历史地位，不肯定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就不会理解三中全会以来是怎样恢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意义；同时如果我们不能总结好、认识清楚若干年来左的指导思想对我们的工作带来的损失，也不会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对这个历史的伟大转折有深刻的认识。而没有这种深刻的认识，就不会有执行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所以，要全面地领会《决议》和六中全会精神，其中包括对多年来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的认识。

同志们对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的探讨是有意义的。《决议》中有几个地方都讲到“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等等。我和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比较恰当的说法是主观主义。同志们对主观主义的特点、表现作了探讨，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想谈点个人的看法，和大家交换意见。

对这种主观主义应当怎样估计呢？这种主观主义的特点是不是在日常工作中的错误呢？没有人这么说。我认为不是这么一回事。这种主观主义是不是反映了一些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思想，也就是说带有哲学上的错误表现呢？我认为应该这样看，可以研究。

《决议》分析了这个错误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原因。犯错误总有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在主观原因中间，有刚才我们引到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不光有做法，还有思想，有某种思想或者哲学观念的倾向。当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哲学原理，没有以理论化的哲学理论、哲学原理表现出来。所以说它是主观主义，这是恰当的。

《决议》中讲到两个夸大：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这就涉及到观点问题，这是主观主义在经济工作中的一种表现。同志们在讨论中说是从片面性而来的，我同意，但是片面性有两种情况。毛主席讲的片面性、表面性也就是主观性，讲的是反映情况的片面性，只看到一方没有看到另一方，是反映的片面性、了解情况的片面性。还有一种片面性，譬如说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上，在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上的片面性，就是说在它们的作用的理解上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是不是列宁讲的把认识问题这样复杂的曲折的过程中的一个方面、一个因素、一个片断夸大了就会导致唯心主义，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决议》中讲的在大跃进中在经济建设中“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不仅仅是了解情况的片面性，有了解情况的片面性，没有如实地反映实际情况。不仅如此，这种主观主义把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片断夸大了，就要导致唯心主义，就是产生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这是一点。

其次，在政治上，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有没有观点、理论的问题呢？《决议》上明确讲有观点，而且看起来是比较有系统的。所以，文化大革命的产生不仅是思想落后于客观情况的变化，如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实现以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存在了，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个事实，作为领导的指导思想没有看清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了，我们的思想没有跟着变化。有这个问题，但是不仅仅是这样。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还表现了一种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看法、论点。《决议》中讲：“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所以说有论点，是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但是就文化大革命来说，有论点，其中包括一定的哲学观念。

再其次，《决议》中许多地方提到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一种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观点。如果说在经济上我们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在政治上夸大了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的一套东西，那么在意识形态上的个人崇拜就巩固了前两个错误，使得前两个错误一时更加难以消除。无产阶级的运动，社会主义社会中关于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本身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偏到那一边都是不行的。这么长时间的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狂热的程度，这偏离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我们说这些东西没有形成和马列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原理根本对立的理论，所以从总的来说是主观主义，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在一定的特殊的条件下在思想上的失误。有些同志讲，这些观点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不能说没有联系，这个问题怎么提法好，可以研究。所以，如何全面地深入地研究《决议》，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我们今后还应在这方面多下功夫。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还值得我们再学习。毛泽东同志在那里提到知识分子的改造，说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还说人人都要学习、要改造。而且他明确地说他自己也在内。马克思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革命中间要不断地改造我们自己，学会领导新社会的能力。无产阶级也要改造。空想社会主义者希望从天上掉下那么一批干干净净、纯洁无瑕的人来建设新社会，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所以不能有“顶峰”，不能绝对化，任何人都不能神圣化。

第二，谈谈如何科学地对待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问题。乔木同志讲，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既不能贬低，也不能提高。这个观点非常重要。贬低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是错误的，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估计不足是不对的。国外有人说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是抄苏联三十年代的一些书籍上的提法，是凑起来的。这是别有用心。前一段拨乱反正过程中间，针对文化大革命中达到狂热程度的个人崇拜，有一些同志将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中有利用三十年代苏联某些书籍中某些思想资料、研究成果的情况，作了一番对照研究。这种研究本身并不错，是应该的，免得我们懵懵懂懂地说这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提出的，那也是第一次提出的，这个是全面的，那个是天才的。这些东西，我们很容易驾轻车，就熟路。在六十年代初，康生在中央党校让我们检讨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看没看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最高最后的标准”。检讨的结果，大家都没

有达到这个认识，只有康生一人达到了。所以大家很紧张。在六十年代写了一些头脑相当热的书，你说这是第一次，我发现那个是第一次，你说这是全面的，我说那是天才的。就熟路那一套很容易。所以我们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时候，这两种片面性都要注意。但是如果得出结论，说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是抄人家的，有发挥也不多。对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估计不足，那也是不对的。

如果说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吸取了三十年代苏联、国外的甚至国内的一些著作的某些思想资料、研究成果，这是事实。这种情况，我们在五十年代已经有所了解。你看米丁的《辩证法唯物论》，对“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讲到了；你看爱森堡、西洛科夫的《唯物辩证法教程》，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也讲到了。我们发现毛主席也吸收了他们的一些观点，但丝毫没有产生象有些人认为毛泽东同志也不过是抄人家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把两种书对照了一下，那是大不一样的。一是苏联那些书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并不是那么系统。另外，那些哲学工作者的某些问题上的某些论述，和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军事家的论述大不一样，那个境界大不一样，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认为毛主席只是抄了好些东西、吸收了好些东西，即使是没有恶意，那也是太肤浅了，说明我们的哲学思想的境界太低了。我们应当看到，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是对中国革命经验本身的总结。他吸收了一些东西，参考了一些东西，但从根本上讲，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上的概括，这个东西是抄不来的。这种哲学思想、哲学著作又是经过中国革命的胜利检验过了的，是胜利了的哲学思想，是对马列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当然，也不能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面的发展，如同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全面丰富和发展一样。这并不等于降低毛主席哲学思想的伟大意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讲到的某些东西，毛主席没有必要去重复、发挥。

那末，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是不是有特点呢？当然有。这些特点是什么？值得研究。研究这个问题，要和毛主席要完成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考虑，才能想得清楚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他们的伟大贡献。在创立之后，他们就把这个世界观运用于各个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继续完成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还有科学社会主义。另方面研究工人阶级的斗争策略问题。恩格斯在晚年还研究了自然辩证法。列宁在新的历史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保卫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发展了认识论，在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条件下，为了在新时代发展革命理论和策略下了很大的力量研究了辩证法，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这些是列宁主义的哲学的特点。毛主席面临的是另外一种任务。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没有马列主义的指导，就没有中国革命胜利的可能性。有了马列主义指导、马列主义传播，中国革命才有了胜利的可能性。但是不能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也不能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完整地结合起来的的历史任务，主要地是由毛泽东同志来解决，来实现的。所以，一般地说，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是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特殊地说，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的认识论、方法论。就是说，毛泽东同志有他

自己的哲学思想，他有高过别人的地方，他在哲学上解决了某些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某些思想，他才能完成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任务。在解决这个特殊任务中间，他进一步解决了怎样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研究了它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是什么，主要在这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发挥和发展。

我们看《实践论》。《实践论》并没有全面论述实践在社会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的若干著作中是全面地作了论述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中，马克思讲了生产实践在改造自然中的作用、革命实践在改造社会中的作用、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三个大的方面。《实践论》没有着重发挥前两个东西，他解决的是在认识论上以马列主义原理为基础，发挥的是实践在认识上的意义、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他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等等。所以我们读《实践论》，包括宣传《决议》，都要把它和当时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正象我们学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要和它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一样。我们的干部需要认真学理论，这在多年来我们强调得不够。毛主席强调了认识来源于实践、为实践服务、在实践中发展等等。这绝不能说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没有说明理论的指导作用。理论的指导作用，《实践论》中是有论述的。正因为毛主席注意了、理解了、强调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他才要解决那些教条主义者对理论的作用的错误看法，对理论的来源的错误看法。所以不能得出结论说毛主席不重视理论的作用，就是从《实践论》本身也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所以，我觉得我们宣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宣传《决议》要注意做到全面。

我们再说《矛盾论》。与以上是同样一个思想，都是要从认识论、方法论上解决怎样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一般地说是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所以他把矛盾的范畴和普遍性、特殊性的范畴结合起来。矛盾规律作为教科书的体系来讲，好象先要讲什么是矛盾，接着讲同一性和斗争性，然后再讲其他问题。《矛盾论》先讲普遍性和特殊性，所以《矛盾论》的体系，是理论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反映。把矛盾的范畴和普遍性、特殊性的范畴结合起来，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这个辩证法的实质核心，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结，也就是矛盾问题的精髓。其次，《矛盾论》是分析复杂的现实的矛盾的逻辑体系。可以说，《矛盾论》第一点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发挥，第二点突出了矛盾的精髓问题，第三点，《矛盾论》具有自己的性格。它是分析现实的复杂的矛盾的逻辑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反对了形而上学，改造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创立了唯物辩证法之后，就用这个理论去研究现实的复杂的矛盾，譬如写了《资本论》，但是他们并没有系统地去写研究现实的复杂的矛盾的逻辑体系。列宁针对第二国际贬低辩证法、反对矛盾规律，他恢复和发展了辩证法，把辩证法应用于分析帝国主义的现实的复杂的矛盾。但是他也没有专门去写分析现实的复杂矛盾的逻辑体系。《矛盾论》所要处理的是在中国革命这一非常复杂的曲折的矛盾运动过程中，怎样把马克思创立的、列宁发挥了的矛盾原理用来分析中国革命中的现实的复杂的矛盾，分析研究的结果又概括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把它反映到《矛盾论》中来。所以他研究的是现实的复杂的矛盾的逻辑体系。因此一系列的问题都来了，矛盾的特殊性的五点来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问题来了，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来

了，这些都涉及到怎样认识和分析现实的复杂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矛盾论》不是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抽象的矛盾理论问题的研究。看来，《矛盾论》具有这样的性格。

总之，研究毛主席哲学著作的特点要和他要解决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他要解决的哲学任务，最根本的就是如何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探讨它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是什么。所以，可不可以说，毛主席的发挥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纲领、路线的哲学思想基础。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在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制定党的方针、政策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也加进了新的东西，譬如两类矛盾的学说，十大关系，等等。在这方面他还没有充分地展开研究，后来在思想上便犯了严重的错误。其次，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他的哲学思想是和中国长期的军事斗争相联系的，所以他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军事方面的辩证法。再次，由于他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同时也由于他个人的特点，所以他的哲学思想在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方面有很大的发挥。毛主席曾经讲过，他在好多著作中有意地讲一些哲学道理，帮助广大干部掌握哲学理论。我想这可能与他的个人特点有关系。斯大林领导苏联革命的时间也很长，也讲哲学，但是，通过讲领导方法、工作方法自觉地讲一些哲学道理，没有毛主席那么突出。当然，除此以外，《决议》讲到的那六个方面，都包含着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作为它的基础。

那末，毛泽东哲学思想有没有一个特殊体系呢？我认为，不能说有一个自外于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一个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正如列宁没有一个自外于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哲学思想体系一样。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不是有自己的特点呢？有的。他的哲学思想是不是零散的、片断的、毫无联系的呢？也不是。所以一些同志探讨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意义在于想探讨一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从这个方面讲，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但是因为马克思列宁讲了那么多，如物质和意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毛主席就不必要去讲，因为他的任务已经不是要重复地去解决这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你说他自立一个体系，哲学基本问题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他没有讲，你说是不是他的漏洞呢？那不好这么说。他的哲学思想是在这个前提下的发挥。

其次，《决议》上讲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那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能不能构成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这三条原则在《决议》的最早的稿子上就有了。第一个方面，实事求是，讲的是直接的哲学命题。第二、第三个方面，群众路线、独立自主，里面有哲学思想，但好象是个运用，如群众路线，是毛主席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和认识论中实践的社会性以及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有个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等等。群众路线成为我们党的根本路线。但它本身似乎不是直接的哲学命题，是运用。那么为什么又说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呢？因为是贯穿毛泽东思想六个方面的基本的东西。所以，我认为用这三个方面来构成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可以不必。因为毛主席的好多丰富的哲学思想如果都放到这三个方面，那就很牵强。

再一个意见，能不能对《实践论》、《矛盾论》进一步作探讨，使它更进一步精确

化，能否在实践过程中，在概括实践经验和新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来发展这些思想呢？我看是可以做这个方面的工作的。这不等于是否贬低。同志们在发言中提到，毛主席在六十年代就说过，光有《实践论》、《矛盾论》不够了，要写出新的著作。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实践论》中的例子。《实践论》中对感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的论述，是很深刻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在毛主席所讲的感性认识阶段，使用不使用理性认识的形式（概念、判断、推理）？一些人到了延安看到房子，有没有房子的概念，起码有房子的概念。我们中国人民初期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是否使用理性认识的那些形式呢？感性认识的形式要用，理性认识的形式也要用。但是有没有认识过程的高低阶段之分呢？有的，低级阶段属于现象的认识或者说经验的认识阶段，高级的认识阶段是属于本质的认识或者理论的认识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间感性的认识形式和理性的认识形式都用，不能把两种认识形式截然分开。国外对这个问题讲法不少，有人也想借此贬低《实践论》。我看《实践论》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使它更加严密化精确化呢？可以的。国外有些哲学动态很值得我们注意。例如，关于实践问题的讨论，特别是随着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的发展和广泛运用，使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讨论相当细致了。我们经过了十年动乱，打开门户一看，有很多东西不懂了，我看我们研究认识论可以好好研究控制论、信息论、系统工程。这些在国民经济中、社会生活中用得越来越多了。那里面涉及到很多认识论、辩证法的问题。我们写哲学课本，应该怎样估计我们的对象？他们已经不是五十年代刚进城时的老同志了，就是这些老同志也有了许多变化，一些同志通过各种方式的学习，对控制论、系统工程等等，比我们了解得多，你还讲猴子变人已经不能适应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是很好的，不存在危机；而哲学工作者本身的命运现在倒需要我们自己来考虑，有一个能不能跟上发展的问题。

《矛盾论》的某些论述有没有一个严密化精确化的问题呢？我看也是有的。例如，大家经常讨论的生产关系等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问题。我觉得毛主席的论述也是非常深刻的。恩格斯1890年9月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讲到好多个“决定”、“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作用”，我查了一下原文德文是两个词，一个是“规定”的意思，译成“决定性的因素”、“决定着”的是这个词。另一个就是“起决定作用”的“决定”，原文是另一个词。原文是两个词，我们翻译的是一个词。可不可以从这里受一点启发，建议同志们作一些研究。至于《矛盾论》里说的两种场合的“决定”，翻成德文或其他外文是不是用两个字，我就知道了。我由此推论，我们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用的大体上是恩格斯讲的那个“规定”的意思，就是生产力规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它的发展方向、发展规律，经济基础规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发展方向和它的发展规律。这个“决定”大体上是在“规定”的意义上用的。在这个时候有没有反作用呢？也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被规定的条件下，有反作用。那末，在一定的条件下，例如当“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象京剧《借东风》里那样，庞士元的连环计施了，阡泽的书也下了，黄盖诈降也成了，等等，其他条件都具备了的时候，有没有东风就成了火攻计能不能成功的主要的决定性环节了。当不改变生产关系，生产力不能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改变生产关系就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决定性环节和

条件了。这是决定性的条件的“决定”。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场合也是反作用的表现。这种反作用不能规定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发展方向，起“规定”的作用的，还是生产力，是经济基础。斯大林讲的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也是在链与环的意义上，当其他环节都解决了的时候，其中某一个环节可能成为整个链条的决定性环节。所以对《矛盾论》的若干问题也可以进一步精确化。当理论界学术界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的时候，不能直接划等号说这是要贬低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可能有贬低的情况，也可能他不是贬低。

第三，谈谈如何加强科学研究的问题。加强科研，这是提高我们的教学质量的需要，是发展哲学学术思想的需要。在上届哲学年会上搞了个文件，说要加强党校系统的科学研究，今年收到的论文比去年多得多，说明科研工作有很大改善。我们党校系统的科研队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把这支力量动员起来研究现实问题，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前不久，有一位县委党校的同志写了一封信给中央领导同志，强调了办好基层党校的重要性。信中说，公社一级干部贯彻中央政策是直接和群众见面的，不能忽视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而现在恰恰是对他们的教育，对县委党校没有足够的重视。我觉得他讲得有道理。

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

首先，《决议》有丰富内容，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如《决议》中讲到的几个方面，毛主席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三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的。《决议》中讲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我国解放后的前三年，按照有的同志的理解只能看成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好好研究一下。当然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其他还有好多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其次，毛泽东哲学思想。这是个很大的科研题目，我们如果能理论联系实际地研究好这个问题，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们党校的同志在这方面责任更大些，你不研究老子、黑格尔，人们还可以原谅，不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党校工作的同志在这方面不下力量，恐怕交不了帐。

有同志讲，在这次会议上是不是研究一下各级党校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动动脑筋，提点建议，如资料的交换、收集等。我们中央党校在这方面是相当落后的了。前不久，我们查了一下，看毛主席哲学著作的版本，最初的版本是什么，图书馆到底有没有。一查没有，可见得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现在我们也准备向这方面努力，大家都来作一些努力和探讨。资料的交流，研究心得的交流，可以开专门的会议，不一定要开这么多人的会议，范围小一点，大家先来探讨探讨，然后再进行传播，看看怎么样。

再其次，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方面科研需要下大力量的。

《决议》上有一段话，写得非常好，讲到“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说道：“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一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就是说，还没有弄清楚的比弄清楚的多得多，的确，社会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到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需要研究的问题太多了。中央负责同志最近讲话谈到经济工作时要求我

们深入实际抓问题，突破框框创新路。现在我们哲学的任务也不一样了。当年，毛泽东同志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它们的任务是为了夺取政权，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哲学的任务不同了，原理是一个，任务不一样，现在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等方面的问题，很值得进行研究。

所以，我们在这里呼吁一下，大家要进一步重视科学研究。我们不赞成那种意见，就是觉得我们党校的人，搞教学是次要的，而搞科研对评职称更现实一点。我看不是的。我们担负着一个光荣的任务，我们面对着这么庞大的干部队伍，如果我们在帮助他们读书，提高他们思想方面，能起到一点作用的话，那末，我们对党的事业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们的岗位是一个光荣的岗位，所以认为教学不重要，下班不重要，辅导不重要，我说这种思想是不妥当的。但是，为了提高我们的教学质量，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们需要搞好科研，不要把科研与教学这两个东西对立起来，应该统一起来。

这些都是个人的意见，说得不对的，请批评。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九日）